

302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遗恨水门

——尼克松传

〔美〕莫尼卡·克罗利 著
文 波 译



A1002488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分	1994年1月16日	(1)
第二部分	尼克松与当代世界	(9)
第一章	冷战结束前前后的尼克松	(9)
第二章	尼克松在中国	(119)
第三章	海湾战争	(182)
第四章	越战遗产	(224)
第三部分	丑闻	(264)
第一章	水门事件	(264)
第二章	肯尼迪、克林顿、托马斯与派克伍德	(309)
第四部分	最后的尼克松	(333)

第一部分 1994年1月16日

1994年1月16日。美国东北部。一个寒冷而晴朗的黎明。冬天很少下雪。很长时间已经难得见到的一天，阳光似乎特别灿烂。往常太阳总是躲在又低又厚的灰色的云层里，夹带着暴风雨。气温在零点冰冻以下，很少有人敢出门，避开酷寒和恰好留在门外的严冬那白茫茫的雪地。

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早晨5点30分工作，刚出门外，受到无情的严寒的袭击，马上回到屋里。他不愿意由于冬天寒冷而放弃散步，他又冒险走出去，只是再一次转回来。他10点钟打电话给我，他好象得了独居陋室的烦躁症，要我当天下午去，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编写他的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

“莫尼卡，”他在电话里说，“我没法出去像往常一样散步。我试走出去两次，但天实在太冷了。我连走到报栏都不行，因为前面人行道上给冰封着了。我害怕摔倒，跌断髌骨或什么地方，后来我想我实在不中用了。所以，我只好坐在这里，往窗外看看。这很像在家里给软禁了。”他停了一停。

“好吧！我肯定，我的政敌很爱听到这件事的！”他说着，笑了，“听着，请你4点钟左右过来，一起写写那本书的最后部分，好吗？”

“一定准时到。”我答道，“请在家里待着，等我将报纸带给你。”

“如果你走上人行道摔断了胯骨怎么办？噢，我的上帝！”

你千万别跌断什么骨头。你还年轻。不过，你很快能治好。”他说，“不管怎么说，小心点！”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他的住处。当我十分谨慎地走上那条人行道时，我听到尼克松在三楼敲敲窗子。我抬头看时，我看到他在向我招手，做手势示意我要抓住扶手。我照办了。他竖起大拇指，对我微笑着。

前门开了。屋里非常地寂静。七个月前，尼克松太太去世后，这屋里变得更寂静了，仿佛由于失去了一位给它带来生机的住客而静下来了。由于前总统尼克松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书房里，其他房间好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从其他房间走过时，常常驻足往里面窥视，仿佛他想看到其中有什么新东西，那会吸引他走进去或使他待下去。他什么也没发现，转身就走，按原路返回书房，那熟悉的房间好像只属于他。

“莫尼卡！”我爬上楼梯顶端到达三楼他的书房时，他喊道，“你按着扶手上来，我很高兴。否则你会滑倒摔断骨头的。我的上帝！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还有谁能编这本鬼书？”他说着，笑了，“在你平常坐的椅子上坐下吧！”

他拉直了领带：“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知道这编辑的事很枯燥，但我们不得不艰苦地搞完它，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书……”

我提醒他：那方面内容从1962年他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出版以来已经反复使用过了，“你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以让人相信的了。”

“我明白。”他说，“可这回我是动真格的。”

我们一起笑了。

“好啦，我就算你对，行了吧！不，我真想是这么回事。我拿不准，我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他停了一停，“如果我活到100岁，也许我会那样。”

他从我们前面有垫的矮凳上拿起书稿的草稿本，并戴上眼镜。

他不等我回答就举起手说：“我知道你会常常对我说些好话，说我不算老，我很赞赏，但这是严重脱离事实的。”

他将一部分书稿交给我：“要做这个，惟一的办法是一行一行来。我们应该比我们的批评家们先走一步。如果你发现哪怕是一点小东西使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将它拿掉。这是件很艰巨很艰巨的工作。不过，如果我们写出了一些得体的东西，一些会产生影响的东西，那是很值得的。”

花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读了《超越和平》中200页部分以“超越和平的美国”为题的内容。为了保持内容上的一致性，尼克松常常大声朗读句子，以决定它们是否表达了准确的意思，然后无情地挥动他的钢笔，改掉不合适的短语或多余的段落。

编辑工作完成以后，尼克松将书稿扔到地板上，取下眼镜，将脚伸到有垫的矮凳上：“我最终会挨骂的。我们按录音时间的速度完成了！现在，在将稿子交给出版商以前，我们只要再做10次就行了。”

很显然，他太累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交给出版商的书稿应该是第一流的，这样，他就不用花功夫加工了。他们会很赞赏的，说实在的，我也很赞赏。我讨厌不得不再看看这些材料，这你明白。”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写得不错，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实在太好了，可你决不知道人们在想些什么。如果克林顿受欢迎的程度提高了，这本书也许不会很受欢迎。这本书出版时，如果个个都去祝贺他的巨大成功，那就会削弱本书的影响。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拿出我们尽力而为的最好的书，希望引起人们注意，也许连克林顿也会注意的。”

我告诉他，虽然克林顿不会同意他对国内政策的许多观点，也许他更能接受和倾听尼克松有关外交政策的一些建议，特别是由于他已经注意到他过去提出的一些建议。

“这是个好想法。”他说，“尽管他相信一些错误的东西，克林顿是个勤奋学习的人。他不怕听从别人的意见。我惟一关心的是，如果他的威望维持不了很久，他会太过于自信而不愿听取我的意见。”

他在椅子上动一动，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更紧迫的问题：他辞去总统职务至今迫在眉睫的20周年和它可能产生的新闻媒体评述。甚至经过20年的自我辩护和解释以后，每一次新的攻击都使他匆匆忙忙地避开新闻界。

“也许我们应该关心出书的时间。”他说，“也许我们应该关心在8月份水门事件时同时出书……”他还没说完这个词，就打住了，“周年，”他久久地望着窗外，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如果那些坏蛋不放过它，我就不进行任何答记者问。如果他们问，我一定说，水门事件过去了20年，足够了。的确是这样。这整个周年纪念的事全是一派胡言。谁还关注水门事件？你知道，它纯粹是我们的敌人搞的。我才不以为人们对水门事件的陈词滥调有多大兴趣。”他停顿了一下，“哎呀……也许有吧！”

我鼓励他回避水门事件，集中精力搞他的新书。

“不，我明白。你说得对。”他回答，“这些人将不顾后果地紧追着我。每一回，我写了一篇新的文章，或出了一本新书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们就搞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来否定它。我想他们就爱沉湎于这种水门事件似的废话里，直到他们几乎完蛋了。所以，我反对那么做。”他说着，提高了嗓子并举起他的右拳，“他们不可能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我将出版《超越和平》，然后忘掉它。”他笑着拍拍我的脑袋，然后从

他的椅子上站起来。

“好啦，我想该是停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了。”他说，“你吃什么？”

看完书的时候，尼克松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请我跟他共进晚餐。这个礼节有两个目的：它可以扩展每周的工作，又有人陪他一个下午，否则他只好孤独地度过周末。

尼克松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到酒吧的地方。“我知道你并不特别喜欢喝酒。”他对我喊道，“所以，我一定要给你做一杯不含酒精的鸡尾酒。”我看到他从柜子里取了两只玻璃杯，将几个瓶子放在柜台上，“他们管这叫亚洲的马提尼酒。我首先在新加坡搞到一瓶，后来在巴基斯坦也搞到一瓶。它是一种很美妙的酒，喝完令人精神焕发。到这里来，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我走进书房外的小房间，发现他在拾起掉在地板上的冰块。

“我来替你干。”我提议。

“不用，不用！我已经全扫完了。”他说，“好吧，如果你给自己做这个，一定要用罗丝牌的酸橙汁和打碎的冰块。我做过一次，也许在泰国。但他们不用罗丝牌的柠檬汁，所以我几乎要吐出来。不管怎样，你必须摇动它，然后……”他举起玻璃杯，“好啦，尝一尝吧！你知道，最好加点酒，可我一点也不能再喝了。你爱这么喝。哎，我们不是开玩笑，真的！”

“老实告诉我，”我说，“那些国宴是怎么搞的？”

他畏缩了一下，对这个问题不予考虑：“我太太全包了，从菜单到一切事情。我从不了解究竟上了什么菜，确实不关心。”

· “在那些正式场合，你怎么找机会进行个别交谈？”

“这太糟了。我是指糟得让人难以忍受。”他又畏缩了一

下，“你得跟一对对夫妇坐在一起。你知道，男男女女对事物的兴趣很不同，观点也是不同。那并不是说，我没有任何兴趣跟这些人谈话。我有兴趣跟他们谈。但是，当时作为总统，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你以为我真的注意勃列日涅夫太太说些什么？但我不得不集中精力考虑她丈夫是否会同意限制核武器。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你明白我的意思是……”

他吸了一口掺柠檬的奎宁水，然后看看手表：“快7点钟了。咱们走吧！你可以看看我做晚饭。”他说着，转身朝着门口，“你知道，如果你不来这里，我就自己一人做。”

“好吧！我来了。”我答应道，朝着楼梯的方向轻轻地点头，我跟着他到一楼去。

他走近立体声唱机，放上一张传统的圣诞歌曲的磁带，然后走进厨房。取出两罐辣椒，再用开罐头刀将它们打开。他将辣椒放在电炉上加温，轻轻地拌成色拉，并将它分盛在两只盘子上。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辣椒吧？可这是我能做的惟一食品。噢，还有热狗。”他说着，瞟了一下辣椒罐子，“很幸运，海迪（管家列特）留给我们一些色拉，所以我们有这些色拉可用。”他说罢，从柜台上拿起一包未打开的芝麻棒形面包。我还没建议打开这只包，他就开始用力撕开玻璃纸包装，把包装打开了，但芝麻子撒了满地板。

“好啦，我至少是打开了。”他说着，脸上尴尬地泛起了红晕，“也许我应该坚持烧菜。算了吧，我从不以为我会那么说的！”

我将芝麻子扫完，然后走进餐厅，他已经在桌上摆好精美的瓷器餐具。

“这是很好的餐具。”他说着，从厨房里拿着面包和色拉走出来，“我想每个人应该经常用他们的好餐具。你将去做什么？”

使用时损坏就再也不用它？请吧！”他对盛着冰凉的葡萄柚汁的玻璃杯点点头，“我希望你会喜欢葡萄柚。我发觉它会减少辣味。来一点吧！”我拿起照相机，跟着他进去。

“我对这个照个相，你不反对吧？”我问，“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为我烧菜。”

他没有回答，往电炉上做个姿势微笑着，“将照相机给我！”他说着，给我照了一张照片，“为了子孙后代，也为了历史性的目的。”他笑了，领着我回到餐厅。

说话很少。用餐时，他对几位第一夫人作了一些的评论。（“南茜·里根很厉害，她几乎控制了一切。巴巴拉·布什也一样，是个强悍而精明的人，但不那么爱控制什么。”谈到控制，我伤心地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正在成为偶像。）前天纽约的巨人们遭到损失，但除了那件事，他说得不多。我们吃完甜点时，他从空荡荡的露天平台往外眺望，只见那光秃秃的树枝在院子里摇晃。

“莫尼卡，你可相信今天就是我当总统的就任典礼 25 周年？25 年前……”

“这看起来好像是那么长久啦？”我问。

他点点头：“有时候是这样。别的时候，它看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

他猛然眨眨眼睛，直望着我：“别为那些碟子烦神，我会处理的。”他站着，将我坐过的椅子拉出来给我，陪我一起走到前门。我转身向他致谢时，他抢先阻止我。

“谢谢你星期天来同我一道工作。人们总以为名人无时无刻不被人们包围着。其实不然。名声、荣誉——不管你怎么称它，可以是个很孤独的东西。许多人知道你，但并不是许多人都了解你，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你越成为一个公众熟悉的名人，你的社交圈子就变得越小，因为你发觉你所信任的仅

仅是很少的几个人。”

并不是尼克松的含混使他那么迷人，而是他的生活的史诗般的时刻改变了纯粹是普通常识、幽默的方法。在那些寂静的星期天下午，我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已经看到的東西：尼克松是真实的。

在那些日子里，尼克松处于最坚强和最脆弱的状态。同时富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他的思想复杂，他的品位一般，既为数百万人所知道，又完全是孤芳自赏的。尼克松成了人民的一个领袖和他们中的一员，具有自己隐私的公众人物，但对于生活所带来的一切又是脆弱的。

在他自己对生活意义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在推动美国在全球的势力中，尼克松从一个普遍人阶层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层，又从至尊之位上掉下来。最后的尼克松并不是一位“新的”尼克松，不是第二个自力更生的政治宣言，而是真正的尼克松，一个充满成就和遗憾、幸福和悲哀的实实在在的幽默的人。最后，他不过是个他生活的冬天里的人，留下了不害怕被人争论和悲剧的过去，它曾表达了使人振奋的胜利和使人泄气的失败；而且它曾逼迫他在他的众多的优点与明显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之间走过他的道路。这是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完全的人类历程，他在南加州留下一片柑橘林，等于说是给 20 世纪的后半期刻下永远抹不掉的标志。

第二部分 尼克松与当代世界

第一章 冷战结束前前后后的尼克松

理查德·尼克松担心美国可能会在这场冷战中遭到失败。

这个在1964年冷战开始时步入政坛、领导美国渡过了十分严峻时期而且亲眼目睹冷战结束的人，竟担心我们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会在冷战中输掉。

他于1980年撰写《真正的战争》，在书中明确指出：“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否则80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最危险和最严峻的时期之一。简而言之，苏联将跃为老大；美国将位居第二。”《真正的战争》写于美国可能丧失世界领导地位和民族意志的严重危险时期，它旨在振奋美国信念，在国外增强这种信念。这本书阐述了这场危机，它有助于美国恢复在世界斗争舞台发挥领导角色的信心。

尼克松担心的是，假如美国不能遏制苏联在世界范围的军事扩张，加强我们自身的军事力量，以便拥有确实可靠的威慑力，我们不仅会在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搏斗中失败，而且将使我们在今后几十年内受到苏联的控制和欺辱。然而直到80年代末，当美国可能赢得这场冷战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时，尼克松又产生了新的担心：这次胜利可能会白白错过。

为了成功地结束这场冷战，尼克松本人投入了全部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进入了国会，帮助哈里·杜鲁门为我们克敌制胜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他揭露阿尔杰·希斯是苏联间谍，这一轰动的事件提高了他在全美作为共产主义激进反对者的声望。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参议员，宣称他的对手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极有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取得了胜利。

作为副总统，他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有关敌对制度优劣的大辩论。1960年，他成为约翰·肯尼迪班子的一员，竭力主张向苏联发起主动挑战。他在1968年当选总统时，从前一任总统那里接收过来的是厌战的选民和资源耗尽的和十分虚弱的经济，他即时提出了以合作取代对抗的遏制政策。在总统任职后期，他对输掉冷战的危险后果发出了严重警告。

与美国任何在世的政治家相比，他或许与冷战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不允许别人在通往胜利的最后关头夺走胜利果实。

尼克松对共产主义在东欧和它的领头国家苏联的瓦解惊叹不已。

尼克松无暇向自己或美国祝贺，相反，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以及盟国在短期和长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上，并开始对政策施加影响。从1990年起到1994年，尼克松写了两本关于对外政策的重要著作，以私人身份到世界各地作旅行考察，对政策制定者和提案人发表了无数次的讲话，并且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游说历届美国总统。如果他最大的担心是美国将使冷战的成果付诸东流，那么，他其次担心的就是掌权人不听他的忠告。

他对对外政策的态度既现实又保守，这是一种基于尊重历史、尊重经验、尊重人类难以驾驭和预料的多变性的思想体系。他把绝对尊重对政府的善意怀疑、个人自由以及公民的不

可推卸的义务融于政策之中，他认为个性和集体性、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永恒的张力既产生冲突又推动进步。

因为他不希望人性发生变革，所以他也不希望未来和过去相比有太大的改变。他拒绝乌托邦思想，相信人有分辨善和恶、冷漠和同情、自私和大度的能力。他在尽量不排斥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对它们加以考虑，同时认识到掌握世界领导权是需要付出真正代价和义务的。

他不喜欢战争，但他崇尚战争所带来的团结和勇敢等一些美德。但他也明白，由于战争破坏性极强，而和平的益处又如此巨大，本世纪的大部分美国领导人都寻求消除战争、确保和平的途径。然而，尼克松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认为这些目标不可能完全达到，世界局势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世界局势走向完美。

带着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尼克松没有对冷战结束作表面陈述，而开始研究它更深层次的趋势和意义。他一直考虑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自1848年以来的告诫：“新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学。”随着一种昔日强大无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两极关系平衡和结盟体系被打碎，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可能导致朝反向发展的不确定性，尼克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在努力确保此事不会发生。

正当全球特别是西方为以共产主义瓦解为前提的“世界新秩序”而欣喜若狂时，尼克松知道，任何一种新秩序只有在美国的引导下才能出现，而且必须冷静地考虑到国家的自身利益才能持续下去。

尼克松的使命是确保他的继任领导人不屈从于那种在对外事务中所持的悠闲冷漠的态度，那将会使冷战的胜利付之东流。他反对那些认为美国和苏联是同等日益衰败的超级大国以及美国蛮可以做许多大国之一的说法。

因此，尼克松开始担负起自己对美国的新的使命。1945年以来，美国制定的目标是战胜共产主义。这一目标完成后，尼克松又致力于确保他所说的“自由的胜利”。这同样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很容易失败。但如果成功，将会实现所希望的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市场改革以及真正的和平。

1990年4月12日，在我开始为尼克松工作两个半月之前，他向波士顿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说，阐述了他有关冷战结束的许多思考。他的观点坦诚直率，社论撰写人、专栏作家以及其他观察家们宣称，随着苏联的开放和改革的到来以及柏林墙的拆除，冷战结束了，西方胜利了，苏联不再对我们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威胁，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使我们团结而不使我们分裂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世界气候变暖问题全球环境保护问题等。

尼克松明确指出，所有这些臆断都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的胜利，苏联瓦解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赢，苏联威胁的消退并不意味着来自其他国家威胁的彻底消失，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东德抛弃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意味着民主会成功。

尼克松认为，我们艰巨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已经从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联盟中分离出来的国家。他说，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认为只要我们仅仅谈论一下“输出民主”，那些国家就会为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极度需要找到答案。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来对付极其复杂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他的观点的出发点是：美国必须援助东欧以及苏联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后果将会是我们不得进行一场新的而且更危险的冷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被尼克松认为是

“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因在苏联实行政治改革、给新闻媒体以更大的自由以及从阿富汗撤军而受到尊重。但尼克松也明白，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所有被苏联征服的第三世界国家每年在经济上使它耗费150亿美元，在它的东欧附庸国，不满和公开反抗已达到沸腾的程度。最糟糕的是，苏联政权的低效和内部矛盾的表现——日用品短缺、犯罪和贪污——使它的经济出现严重倒退。

戈尔巴乔夫发现他的主要强大对手美国已经从70年代的隐患和80年代的衰退中逐渐恢复过来，经济发展了，军事力量强大，并且掌握战略防御主动权，他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才能赶得上。他别无选择，只能实行国内改革、国外紧缩的政策。

尼克松打碎了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幻想，尼克松认为，如果他的改革进行得不彻底，帮助戈尔巴乔夫对他和我们都利；即使他们的改革进行得很彻底，结果我们面对一个经济强大、实行同样强硬对外政策的苏联，帮助戈尔巴乔夫对我们也是不利的。尼克松提醒他的听众说，苏联仍然拥有3万枚核弹头、世界最大的常规军、现代化的海军和长时期实行扩张主义的历史。因此尼克松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和他领导的国家制度依然保持共产主义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应该帮助他。

美国是唯一能够在冷战后领导世界的国家，他对听众说，美国不可能在有战争的世界里永远处于和平状态，也不可能在经济不景气的世界上繁荣发展。他力劝他的听众们要像他那一代人迎接冷战的挑战那样去迎接和平的挑战。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给下一代留下的遗产将是使世界“对自由有安全感”。

“莫尼卡，我想让你读一读我这篇几个月前的演讲稿，然后向我谈谈你的想法。”尼克松在1990年7月11日对我说，“我知道你刚开始工作，不可能一夜间对世界的命运作出判断，

但我想让你读一读。我们明天讨论一下，好吗？”

我刚为他工作了一星期，他雇我为他做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意见和观点，以便完善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甚至或许会激发出新的想法。

那天晚上，一边读一边做笔记。第二天早上，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作了充分准备和他讨论那篇演讲稿。但尼克松提出了一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真正需要什么？你知道吗？”他问道。

我回答说，叶利钦退出共产党并开始和激进改革派往来之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首先把重点放在修补党内裂痕的工作上，以便为他的改革保持住一个舞台。但改革派只是想修补共产主义制度，而不想完全铲除它。尼克松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我知道，你经常说美国如何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比它内部体系更重要。”我继续说，“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一个国家除非首先不再使它的人民卷入战争，否则它不可能在世界上不发动战争？”

尼克松眯起了双眼：“我知道这个观点：民众更仁慈，他们不会发动战争。有些时候，选择两害中较小者并对他们施加影响是必要的。我过去一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威尔逊的拥护者，但那种对世界的看法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奏效。”

他喝了一些奎宁水，朝我说：“实话告诉我，莫尼卡，如果你是戈尔巴乔夫，你会做什么呢？”

“如果我是戈尔巴乔夫，”我回答说，“我会放下架子站到叶利钦一方，承认共产党没有前途，表明自己顺应历史的意愿，而不是背着历史而动。他必须作出决定。他不能骑墙于共产党人和改革派之间。”

“是的，他不能。”他说，“如果他继续固执地这样做下去，他就会有把两方都失去的危险。这种使用 150 亿美元的西方一

揽子援助计划来解救苏联经济的想法简直是荒谬透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就共产主义的瓦解而言，这如同一列火车驶出了车站。”

“政府似乎认为保住戈尔巴乔夫的政权对我们有利，是不是说戈尔巴乔夫的继任者会更坏？如果他的下一任更好，情况会怎么样呢？”我问道。

“说得好。但布什对戈尔巴乔夫太宽容了。他过分强调私人关系，认为既然个人之间交情很好，他们两国的制度就可以融洽相处了”。

“新闻媒体把布什称颂为一个新的强硬领导人，还说既然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已不再形成威胁了，布什可以而且应该削减几十亿的防务预算。真令人作呕。真是大错而特错。

“这种看法正是目前正在美国、欧洲、特别是德国所形成的症状——对和平极度天真的热情，甚至强硬派领导人也几乎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产生怀疑。这就等于我不能公开地表示怀疑——不过目前还没达到这种程度。我认为布什渴望出风头，你看呢？”

他还没等我回答就接着说：“我认为他这种需要超过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警惕和怀疑。不幸的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原因是右派人士不会因为他们不得不支持里根而表示警告，而根据里根在任职最后几个月里的表现，他甚至会在同戈尔巴乔夫做交易方面比布什走得更远。当新闻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狂热入迷时，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那种魅力如此容易动情。但一旦右派势力狂热起来——嗯，我们都知道问题可就严重了。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发表强烈反对他的谈话了吧？我不想在花园招待会上当讨厌鬼。但时机成熟时——我会表明我们不应该帮助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削减防务预算的观点。”